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第二辑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第二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敦煌吐蕃文献研究论集**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42.75印张

1983年12月第一版 198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1209·20 定价：13.00元

# 序言

邵廣銘

我們所要建立的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迄今還處在慘淡經營的難產過程中，但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編輯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一輯，畢竟在去年印成問世。問世之後，且曾陸續得到國內外同行學者們的指正和鼓勵，使我們深感鼓舞和振奋。經過近一年來的努力，我們又編成現在即將付印的這本論集第二輯。今後我們仍要這樣堅持下去，每年出版論集一冊。

在編輯這本論集第二輯的過程中，我們承蒙杭州大學的姜亮夫先生、山東大學的王仲榮先生、久居香港的饒宗頤先生、歷史研究所的唐耕耦先生、中山大學的姜伯勤先生和本校的季羨林先生、周祖謨先生都賜以宏篇巨著，不但使本集增添了光彩，而且使本集的質量得到極大的提高，這不論對我們或對讀者，都是異

常地欣幸并不勝其感激的事，而與我們這個研究機構之所以取名為中心的意向所在，也是正相符合的。

建立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建議，是在一九七八年提出的。之所以提出這一建議，是有鑒於，從建國之初直到四人幫被粉碎之日，在中國的中古史這門學科當中，真正把馬列主義與中國歷史實際結合得較好的著作還為數過少，而這一行當中的后起之秀也還沒有項背相望地培育出來。就北大中國中古史的師資力量來說，儘管在十年浩劫中北大歷史系是一個嚴重受災單位，但幸而生存下來的學有所專而也可以培養后生的中年以上的人，却還不少於五七人。如能着意創造一些方便條件，使他們能夠通力協作，每個人都可領導一個梯隊，相互之間又可構成一個聯隊，既可各顯神通，也能互相切錯，便可以較快地作出一些成果，也可以較快地培養出一些人才。計劃中所要致力的課題，一為屬於這一時期的斷代史和專題史的研究，二為外國學人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著作的介紹和翻譯，三為古代史籍的整理（已經付印的有唐律疏義校點本，即將完成的有凍水記聞校點本，四為敦煌吐

魯番文書的研究，第三、第四兩項工作最先上了馬，而最先印行問世的則是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

敦煌、吐魯番的遺書和遺物，所涉及的方面均極廣泛，歷史的、地理的、宗教的、法律的、政治制度的、社會風習的、學術思想的、語言文字的、文學藝術的，等等，這決非少數專家學者（即使是博學多能的）所能全部精通得了的，因而就有賴于斯道同行們群策群力，各攻一面或幾面，以期各自有其突破點，我們則樂于為此類論著提供一個刊布園地，眾擎易舉，踵事增華，正是攻克這一學術陣地的最有效方法，因此，我們熱切地希望國內外的同行們能源源不斷地把有關這一學術部門的新作寄下。

專就敦煌學的資料整理和文獻研究來說，北京大學是具有較久的傳統的，早在二十年代內，劉復教授就從巴黎圖書館手抄了百餘件敦煌卷子，編為敦煌掇瑣刊行。在卅年代，向達教授和王重民教授又相繼到巴黎和倫敦，都轉錄了大量的敦煌文獻。四十年代前期，向達教授曾兩次到敦煌，對其地的地理形勢和文化遺迹進行實地考察，先後寫成唐代俗講考、莫高窟、榆林二窟雜考等多

篇論文。王重民教授則先后撰寫成巴黎敦煌殘卷叙錄、敦煌古籍叙錄、敦煌曲子詞集、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等書，既總括了前此研究的部分成果，也為后来的研究者建立了必須經手的津梁。他的金山國墜事零拾，更是利用敦煌文獻補史證史的重要著作。

上述諸教授所已經開辟的路徑，所已經作出的貢獻，是我們所必須繼承并加以發揚光大的。因為，不在繼往的基礎上，是不能開來的。

我們認為，既然把敦煌卷子作為歷史資料看待，則在文獻學的整理方法之外，還應把它們作為考古學上的所謂遺物，運用考古學的方法進行整理。這就是說，要把這些敦煌卷子，根據其形制（紙幅尺寸、界格情況、紙張性質等）和紋飾（文字式樣、書寫體制、裝潢樣式等），從其外形上加以分期。這種要把敦煌卷子考定年代、進行分期的工作，正就是我們在開來方面的一個設想。

在日本，也曾有人對敦煌卷子進行過分期研究的嘗試，但其所用資料僅以有紀年的卷子為限，這并不能解決很多問題。因為，在敦煌卷子當中，有紀年的只占極小極小的比數，必須把最大量

的不具紀年的卷子進行分期，然後才能進而解決這樣那樣的諸多相關問題。

敦煌卷子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是佛教書籍，數量最大，第二是非佛教書籍，經史詩文，品類也很繁雜，第三是公私文書。以下僅以公私文書為例，說明其分期的必要性。

敦煌卷子的公私文書中，無紀年或紀年不清楚的，為數頗為不少。這些文書所反映的敦煌地方情況至關重要，所以亟需把它們的書寫時期考查得細致明確。例如，就從盛唐至五代至北宋初年這一時期而言，就應該根據文書格式的不同和紙張字體的差異，而把所謂，建中（唐德宗年號）—陷蕃之前的時期，吐蕃統治時期，張氏統治時期，曹氏統治時期，都一一劃分清楚。這樣就可進而了解，到當地民族的變遷，田制的變化，家庭構成的變化等方面的問題。如此則關於這一時期的敦煌的歷史，特別是當地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演變情況就全可了如指掌了。在那個時期內，敦煌的歷史地位十分重要，弄清了敦煌的諸方面情況，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弄清了整個河西走廊的情況，甚至向西還可延伸到更遙遠的高



昌。故分期工作所關確極重要。

到目前為止，上述種種也還只能算是一些設想，但願中古史研究中心能夠順利建成，我們所要建立的梯隊和聯隊也都能夠順利建成，到那時，我們才可以發揮集體的力量，分工協作，把這種種設想逐步變為現實。

一九八三年九月

# 目 錄

记敦煌写本的佛经

敦煌学之文书研究

新博本吐火罗语A(焉耆语)公弥勒会见记剧本

13 $\frac{1}{2}$  13 $\frac{1}{2}$  19 $\frac{1}{2}$  四页译释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

记吐鲁番出土急就篇注

法国所藏敦煌汉文文书新目释例

敦煌四件唐写本姓望氏族谱(?)残卷研究

试论勾官——唐代官制研究之一

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

马社研究——伯三八九九号背面马社文书介绍

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

王重民遗稿

姜亮夫

李羨林

王仲萃

周祖谟

左景权

唐耕耦

王永兴

姜伯勤

卢向前

安家瑶

一

二六

四三

七二

一七六

一九〇

二二二

二八一

三二九

三六一

四三五

高昌官府文书杂考

吐鲁番出土记德达吉身校释

吐鲁番发现唐写本律疏残卷研究

吐鲁番出土的两份唐代法制文书略释

吐鲁番阿斯塔二三五号墓出土的部分文书的研究

——兼论吐谷浑余部

敦煌遗书论文集序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五卷——旧刊新评

——敦煌文书学发凡之一章——

说翰石——吐鲁番文书札记

敦煌卷子札记四则

编辑后记

祝总斌 四六五

王永兴 李志生 五〇二

刘俊文 五二五

许福源 五三三

齐东方 五八一

周一良 六二六

左景权 六二〇

饶宗颐 六二七

荣新江 六三二

# 记敦煌写本的佛经

王重民遗稿

公元四二一年，北凉灭西凉，四三九年北魏又胜北凉。从此，北魏在敦煌派遣了地方官吏。当后凉、西凉和北凉统治的时候，凉州地方的佛教已经大大兴盛起来，凉州成了翻译佛经的重要地区。本来在西晋初年，月支人后嵩的竺法护就是在敦煌译经的，中译本也就必然先在凉州流传。释道安在三七四年编成的《综理众经目录》，有《凉土异经录》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可见凉州从很早的时期译经事业就很盛了。有名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Kumarajiva三四一—四一三）就是随着吕光住在姑藏的。另一位著名的译经大师昙无讖（Dharmakṣema三八五—四三三），也是在姑藏翻译了《大般涅槃经》等十部大乘经典。昙无讖是先到敦煌住了几年，四二一年北凉灭了西凉，沮渠蒙逊才把他请到姑藏译经的。这时候，中土佛教也已盛行，所以符秦和北魏争着聘请鸠摩罗什和昙无讖东来，沮渠蒙逊不肯答应北魏的要求。

甚至把曇無讖杀死。四三九年北魏灭了北凉，这时候，北魏又已经统一了中原地区，译经地点就东移了。所以北魏派遣东阳王元荣镇守瓜州——当时敦煌是瓜州的首府——的时候，他便大量传写佛经。而当时所写的佛经，竟有十多卷在敦煌保存到了今天。

敦煌千佛洞，据敦煌所出的文献记载，是公元三六六年乐佛法师开凿的，随后又有法良禅师营造。这时候，鸠摩罗什、曇無讖等洗都还没有到敦煌，但凉州的佛教已经兴盛起来，所以有不少的僧众选择了鸣沙山去开窟建寺。约距木樽开窟的五六十年以前，著名的书法家索靖——敦煌人，二三九——三——曾经在鸣沙山上题过「仙巖」两字，这表明在乐佛以前千佛洞可能已经被造为佛经圣地。从此以后，开窟建寺，雕像写经，一直继续下来，就装扮成为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梵宇琳宫互相辉映的千佛洞了。

自从四三九年北魏灭北凉之后，敦煌成为北魏统治瓜州並控制西陲的重镇。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上一八一年为吐蕃所占据，敦煌经历了北魏——以及西魏——北周——隋——唐——三个朝代，特别是隋（五八一——六一——）唐（六一八——一七八——）统一时代，敦煌地方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上，以及在东西交通的孔道上，越往后越显出它的重要。因此，驻在敦煌的官吏和敦煌地方上的士族地主也越往来越多，他们对本地方以及东西方面地区的压迫和剥削也就越来越大。他们剥削来的钱财有一部份供他们奢华浪费，另外不小的一部份就用在千佛

洞上开窟建寺，写经造罪等方面。在千佛洞，随着寺院的开创，僧人的加多，佛教寺院的庄园经济因而建立起来。这些情况的发展，应该说是在北魏、西魏、北周时期（四三九—五八〇）。一开其端，到隋唐统治时期（五八一—七八一）达於极盛。在隋唐极盛的时期，佛教寺院的经济和文化巩固以后，寺院的藏经图书馆也逐渐发展起来。寺院中的僧人抄写、购买一部份，又利用布施（布施经卷或出钱写经）的方法，收藏了很大一部份的佛经。在公元七八一—八四八年吐蕃统治的时期，地方上的生产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佛教寺院的经济剥削並沒有减轻，开窟建寺与抄写佛经也没有减少，所不同的就是以更迅速的速度增加了藏文的佛经写本。但由于地方经济的破坏，纸墨的质量降低，所以从七八一年以后，佛经的写本粗糙了，字迹的端整美观也不如以前了。尤其在八四八年以后，敦煌地方与洛阳相继建立了以张氏、曹氏为首的地方政权，与唐代的中央政府建立了联系，但由于中间被迴鹘的军事力量所阻隔，与唐代的交通道路不能畅通；唐朝从七五五年安禄山叛乱以后，国家的经济力量大大衰退，对于敦煌不能有所接济。这就使得这一时期以后（八四八—九九六）敦煌的经济更差，反映到佛经上面的就是写本纸墨低劣，甚至比吐蕃统治时期也不如

3!

敦煌佛经上面有一部份打着三界寺的藏书印记，说明在最左的一段时期，即张氏、曹氏统治时期，敦煌的佛教寺院图书馆以三界寺为

## 记敦煌写本的佛经

四

最大。但敦煌所出的图书那样复杂，不像是在本末为一个佛教寺院图书馆所专有，所以有人推测是西夏的兵力没有达到敦煌以前，有人（应该说是敦煌的都僧统）把若干寺院的藏经统统藏在二八八洞内，并在前面筑起複壁，就逃走了。大概后来这些人没有回来，地方再没有人知道那件事情，所以一直封闭到一八九九年才被发玩，打开。

敦煌写本内最后的一个年月为「至道二年」（九九六），但西夏佔据敦煌是在一〇三六年，如果按二八八洞的複壁是封闭在一〇三六年或稍前，不可能没有九九六一。三六年前间的文献，但里面竟没有这四十年间的文献。第二八八洞究竟封闭在什么时候，问题还没有得到完满解决。

总之，封闭了将近九百年的一个佛教寺院图书馆，突然把九世纪以前的藏经献给九世纪以后的人，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事件！其中所包含的数以三万计的佛经和各种文书，在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不可估计的！可惜的是这个第十世纪的佛教寺院图书馆在一八九九年发玩后不久，便被帝国主义分子劫散了。盗劫文书的有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间的斯坦因（Sir Mark Aurel Stein），一八六二—一九四三—和伯希和（Paul Pelliot 一八七二—一九四三）。随后又有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来「探险」的分子。直到一九一〇年清政府才把被劫余的部份运到北京，现存于北京图书馆内。

斯坦因劫往伦敦的现藏于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图书馆，

伯希和劫往巴黎的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Bibliothèque Nationale)。为了说明藏书中的神经部份，先大致谈一谈那些经卷的收藏和整理情况。

1. 被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一九一〇年由学部交给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敦煌经卷，在一九二二年由陈垣整理编目，一九三一年出版了《敦煌掇瑛录》大册，十四册。共著录佛经（包括极少数其他文件）八六七九卷（这里是以一个编号为一卷，但有时一号内包括两卷或三卷），一九六二年点查核实为：八七三四卷。一九二九年又从编余的残卷残片中，选出了一一九二卷。这些，都藏在现在的北京图书馆内。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特别关心这份宝贵文化财产，对于旧有的点查整理以外，还大力购买并劝收藏家捐赠，到一九六三年，在上述两部分之外，又收入了大约二〇〇卷。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写经原卷已经接近一万二千卷了。其中，佛经的比重最大，约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就是说，约有佛经一万一千五百卷。

2. 斯坦因盗劫的总数，据他自己说是九〇〇种，据一九五七年出版的《管理斯坦因所编的《敦煌汉文写本文书解题目录》》(Lione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rk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一九五七) 是六九八。个卷子和小册。又有五〇〇多件佛教艺术品，分藏在不列颠博物院和印度的新德里博物院，有一九三一年编礼编的《斯坦因盗画目录》(Arthur Waley: *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urel Stein preserved in the British Museum and in the Museum of Central Asian Antiquities, Delhi, London 一九三二。翟理斯的目的在内，包括五十多个梵文、藏文、粟特、于阗、回纥等文的卷子，也多数是佛经。另外还有大量的《推九》。种的数量统计，应该不少于一五〇〇卷。西藏文卷子，旧藏在伦敦的印度事务部 (Indian Office)，现在不知在何处。在上述六九八〇个汉文卷子和小册内，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佛经，这就是说，其中大约有佛经六〇〇〇卷。

3. 伯希和盗劫的确切数目不大清楚，大约不少于一五〇〇件。在这一批汉文卷子中，中国的四部书和历史文献最多，所以最有名。据王重民编的《伯希和劫经录》，内有大约二五〇〇多个汉文卷子、小册子和版画叶，还有一〇〇多个梵文、藏文、粟特、于阗、回纥等文的卷子。其中佛经约占百分之六十五，即大约为一六〇〇卷。这里还有少数的佛教艺术品，但伯希和盗劫的佛教艺术品的绝大部分藏在卢佛尔宫 (Palais du Louvre) 和纪梅博物馆 (Musée Guimet)，由于没有一个总目录，数量不详。至于藏在国家图书馆的藏文卷子，由拉卢女士编出一个《敦煌西藏文写本目录》，(Marcelle Lalou: Inventaire des

Manuscripts tibétains de Tunh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grec Nationale Fonds Palais tibétain Paris, Tome I 一九三九, Tome II 一九五〇) 这两册，已包括了二、二八二个卷子；据她说，不久还将出第三册。看来伯希和盗劫的藏文卷子，大约接近二〇〇〇的样子。